

《中共党史》讲稿  
(供 讨 论)

## 党在一九五七年的 工作和“大跃进”的失误

曲 方 明

从1957年到1966年，被称作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十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段。1957年是第一段，沿着八大路线前进，党领导经济建设取得了好成绩；但是，党的领导思想在这一年逐渐滋长了“左”的倾向。1958年到1960年是第二段，党的领导在这几年发生了全局性错误。1961年到1966年是第三段，总的说来，党执行了正确的方针，经济调整大见成效；但是十年来未能从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的“左”倾错误终于在经济形势重新好转的时刻爆发为“文化大革命”。

今天的题目包括前两段的历史。

### 一、党在1957年的工作

1.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重要思想的提出。  
反右派斗争问题。

先介绍一下“总题目”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2月发表的讲话。6月19日作为文章公开发表。随后，毛泽东同志把这篇著作的基本思想概括为“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总题目？提出这个总题目有什么意义？

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当然不是全部结束），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却突出了。解决人民内部（包括已经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正在向劳动者转化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8页），而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总题目”的前提和历史条件。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毛泽东同志才提出这个“总题目”。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1956年初，他提议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宣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月，他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除了敌我矛盾外，他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予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更多的创作自由和科学研究的自由。为了发展和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毛泽东同志1956年提出了限制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的任期问题。苏联和东欧的风波发生后，195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他主持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里，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可见，毛泽东同志在提出问题时，注意到了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经验。

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毛泽东同志酝酿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社会主义社会沿着民主的方向发展，在人民内部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题目，而不是把阶级斗争作为总题目，用批评教育的方法，而不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辉思想。

不幸，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逐步滋长了“左”倾错误。这种错误影响很大。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后，毛泽东同志对他的讲话作了一些修改，然后发表为公开的文章。文章不适当地强调了阶级斗争，例如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虽然所作修改没有改变著作的基本思想，但是，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同著作的基本思想是不协调的。1957年10月7日，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论断，又认定阶级斗争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他说，地主阶级臭了，不好说是主要矛盾了，经过反右派，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即富裕中农）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共7000万，是主要矛盾。并说，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包括两部分：一小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部分包含在人民内部。这样，就把阶级斗争引申到人民内部。人民内部包含大量阶级斗争的论点，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的思想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第一，毛泽东同志所以提出这个“总题目”，其前提就是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又说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前提变了，结论怎能站得住？第二，毛泽东同志在《正处》里说：“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如果人民内部存在那么多阶级斗争，怎么能说人民内部在利益上根本一致呢！把阶级斗争引申到人民内部的论点，导致在人民内部大搞阶级斗争的错误。

我们要恢复和发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的

光辉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讲过，人民内部的问题，只要不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都要用教育，疏导的方法解决，而不要再用“大批判”、“阶级斗争为纲”的办法；这同毛泽东同志的提法是一致的。应当说，现在党中央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在“正处”里论述的正确思想。“正处”说，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当前的改革就是运用这个思想。党的十二大要求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把精神文明列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为了改善我们的上层建筑。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之外，又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现在的提法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比起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又前进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有生命力的。

下面谈谈反右派问题。

正当全国轰轰烈烈学习“正处”，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右派进攻问题发生了；党随即组织领导了反右派运动。我们党当时把右派看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派（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6页）。在我们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允许的。对这种反动行为必须坚决反击。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新时期里毕竟是极少的，处理这种问题可以按法律程序办，而不必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

全国划了55万右派分子。经过改正，现在只剩下5000，不到1%。2月间，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为什么到了6月又发生一场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呢？反右派斗争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地扩大化呢？这里有客观原因，例如，匈牙利发生的事件对我们

有影响。我们当时对匈牙利事件的分析有不全面的地方，很担心中国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因此，夸大了国内的“敌情”。从领导思想上总结，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社会主义民主还很不健全。在“四大”中放出的言论，有的属于极端错误。也有许多是正确的。有一些言论虽然包含错误的成分，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所允许的，不当看作是敌对性言论。有些批评意见，讲的是某些具体制度上的弊端，并不涉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却被认为是右派言论。不允许讨论具体制度问题，哪有什么改革可言呢？就我所知，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承认我们的具体制度有毛病，那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小平同志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文选》第287页）承认这一点，有利于我们前进。第二，执政党难免染上官气，听逆耳之言感到不愉快。例如，王蒙同志在1956年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写了一个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官僚主义，有人便大张挞伐：首都是党中央所在地，这里怎么会有官僚主义呢！毛泽东同志曾保护过王蒙。可是，运动发起后，王蒙同志被定为右派分子。再如，有人批评领导好大喜功。领导对此很不高兴。批评者有的被划为右派分子，有的受到了很严厉的批评。回想抗日战争的时候，边区农民因负担过重有些不满，有人发出怨言：雷公打死毛泽东。毛泽东同志听到这种怨言，不但没有表示不高兴，反而调整了政策，改善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为什么1957年对批评意见的反应就不一样呢？因为情况变了，地位不同了。这是一条重要教训。第三，理论上的严重失误。八大对我国的阶级斗争问题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八大开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应邀参加八大的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谈到斯大林晚年的错误，他说，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人民已经用和平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斯大林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是照旧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犯错误的一个根源。可见，毛泽东同志当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是同八大相一致的。八大的时候，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虽然达到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还是不深刻、不巩固的，也没有被全党和全体人民完全理解。反右派运动起来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偏离了列宁关于经济关系决定阶级的定义。到了1958年的武昌会议上，这个概念更加明朗化：经济上的剥削阶级消灭了，政治思想上的剥削阶级尚未消灭。对于这种论点，当时党内不是没有人表示异议，但是，许多人并不认为是错误的，反而把它作为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新发展接受了。这是一个严重的理论失误。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给我们党的工作造成了长期的极大危害。

## 2. 1957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五”计划超额完成。

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根据八大方针讨论了1957年的经济工作。因为1956年发生了冒进，二中全会决定1957年的建设速度要放慢一点。执行结果，195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9%（1956年比上年增长16.5%）。增长速度是降低了，但是，1957年的国民收入总额是908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高于1956年的882亿元。1957年的经济效果好。经过这一年的努力，恢复了国民经济的平衡，消灭了财政赤字。后来，发动“大跃进”的时候，1957

年的经济建设被指责为马鞍形。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的郑州会议上说，1956年是小跃进，1957年是跃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1957年的经济建设恢复了“名誉”：1957年是建国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7年是执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最后一年。五年计划在这一年超额完成了。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41亿元，比1952年增长67.8%。国民收入达到908亿元，比1952年增长53%。

重工业增长很大。1957年钢产量达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3%，比“一五”计划超额29.8%。原煤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5%，超额15.9%。发电量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4%，超额21.3%。

轻工业发展也很快。1957年棉布达到50.5亿米，比1952年增长31.9%。糖86万吨，比1952年增长91.1%，比“一五”计划超额25.3%。缝纫机27.8万架，比1952年增长320%。

农业生产获得重大成就。五年扩大耕地面积5,865万亩。1957年粮食产量3.901亿斤，比1952年增长19%，比“一五”计划超额1.1%。棉花产量3,280万担，比1952年增长25.8%，超额0.3%。

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 3. 党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继续努力。领导思想的转折。

1957年，党沿着八大路线前进，继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的思想，是党在1957年的一项重大成就。

其他中央领导人和有关负责同志对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

针对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同志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他指出，制定计划必须作好物资、财政、信贷的平衡。他还主张在计划工作中以生活、生产、基建的次序来安排财力和物力的供应。陈云同志说，搞经济建设，冒进和保守都是不好的，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陈云同志把防止冒进放在突出地位，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

1957年5月，刘少奇同志不只一次地谈到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多样性和灵活性。他说，苏联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它只讲计划，搞得呆板，没有多样性、灵活性。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多样、更灵活。他这样提出问题：如果我们只搞呆板的计划，而在多样性和灵活性方面还不如资本主义，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少奇同志还谈到利用自由市场和个体经济问题。他说，汽车好，还是三轮车好？当然是汽车好。但是北京现在还有很多小胡同，汽车开不进去，三轮车却进得去。你取消了三轮车，群众就会感到不方便。我们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主义经济在某些地方还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所以需要利用自由市场、个体经济来加以补充。

周恩来同志同样主张把社会主义经济搞活一点。1957年他在国务院第44次全体会议上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工农商学兵，除兵以外，各行各业都可以允许有一些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见《理



论动态》第534期)

1957年9月15日，邓子恢同志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就农村责任制问题讲了很好的意见。他说，一年来，各地农民创造了一套好办法，就是“统一经营、分散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这一套办法很大地改善了高级社的经营管理。如果沿着这条路，把农村的体制改革继续下去，农业生产的面貌当会早日改观。

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陈云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体制改革的文件。关于工业改革的文件要求把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省（市）自治区领导，扩大地方的权力。文件规定：“在计划管理方面减少指令性的指标，扩大企业主管人员对计划管理的职责”；“国家和企业实行利润分成，改进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改进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除厂长、副厂长、主要技术人员以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这几个文件把八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具体化了。

沿着八大路线前进，发展八大路线，是1957年党中央领导思想的主要方面。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同陈云同志把矛头指向冒进相反，毛泽东同志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3月，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随后，他又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10月，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批评了反冒进，并把阶级斗争重新说成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些都表明，在沿着八大路线前进的同时，党内正滋长着一种偏离八大路线的错误倾向。八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思想转折了。

## 二、“大跃进”的失误

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和六十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震动世界的两件大事，也是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大灾难的两件大事。两件事之间是有联系的，弄清楚“大跃进”运动有助于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兴起。现在分四个小题介绍一下“大跃进”：1．“大跃进”是怎样发动起来的？2．“大跃进”运动；3．纠正错误和“反右倾”；4．怎样评价“大跃进”运动？

### 1．“大跃进”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一五”计划后期，195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我们对这个重大课题已经作出了一些正确的回答。八大所通过的文件反映了探索的成果。八大以后，探索继续前进。不幸，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准备不够等原因，党在探索的路上走了一个大弯子，这就是“大跃进”的失误。

“大跃进”开始发动于1957年九、十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但是，“大跃进”思想的萌芽应当追溯到1955年冬。那时，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因此，1956年发生了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小跃进”的“左”倾冒进。党中央纠正了这种冒进的错误。随后，在八大正确方针指导下，1957年的经济建设得以健康地发展。但是，不适当的反右倾并未就此结束，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反冒进，把加快建设速度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从八届三中全会到八大二次会议，用了半年的时间，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为发动“大跃进”

运动作了一系列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第一，批评反冒进。

为了促成1956年的“跃进”，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底1956年初的反右倾声中，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要求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还提出了“促进委员会”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意思是人人都要作建设的促进派，不要作促退派。这三个东西的中心思想是要在建设中突出一个“快”字。由于领导思想“左”了，1956年初经济建设已经显露了冒进的势头。在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提出追加20亿元预算的意见，没有得到会议多数同志的同意。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和会后恳切地陈述了不同的意见。5月，中央政治局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决定纠正冒进，在经济建设中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实行综合平衡的方针，改变了片面反右倾、不切实际地追求快的方针。（这里可以看到，当时政治局的集体领导还是比较健全的，它能够纠正任何人的不正确的意见。）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央宣传部代《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题为《要反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初稿经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看过。毛泽东同志回到北京后，在社论稿上批了不看二字。（社论于6月20日正式发表）可见，毛泽东同志当时对反冒进是有保留的，是不满意的。一年以后，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毛泽东同志认为国内因此出现了很好的形势，反右派斗争开放的“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表达了领导思想的195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的话）。于是，他决定发动“大跃进”。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批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方针、“农业发展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并说，这三个东西现在要“复辟”了。1957年11月13日，经毛泽东同志审定的《人民日报》社

论正式提出了“跃进”的口号。毛泽东同志认定，要把“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首先必须把党内特别是领导核心的反冒进思想彻底批倒。于是，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以及其他会议，都批评了反冒进。周恩来同志被迫一再检讨。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责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给群众泼了冷水，泄了六亿人民的气，使右派钻了空子，给工作造成了损失。他说，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是骂他的。他还谈了这样的观点，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左”的偏差，可以纠正，但是不应该反冒进。在成都会议上，他又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并把问题提到路线的高度加以论证：搞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为了给“大跃进”提供依据，毛泽东同志在南宁会议上谈了这样一个论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真正的左是比右好。这样的论点，在他1957年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里已经表述过。文章说，有教条主义思想的人，对党和国家是忠心耿耿的，只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有修正主义式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批判反冒进对于发动“大跃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其一，批判反冒进使“左”比右好的思想“深入人心”。它表明，实际工作中“左”的偏差可以纠正，但是作为领导思想上能反右，不能反“左”。因此，一种不正常的气氛出现了，广大干部以至群众恐右，不怕“左”。其恶果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错误长期得不到根本的纠正。其二，批判反冒进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和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反冒进本来是正确的，反而受了不公正的批评，这样就颠倒

了是非，戕害了党风。从南宁会议专断地批判反冒进起，党内形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局面，毛主席的话别人是不能反对的。

## 第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首次提出这个口号，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详尽的发挥。他说，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不要怕马克思，不要怕教授。不能迷信苏联，学习苏联要有创造性。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奴隶状态，不要学贾桂的样子。他列举了古今中外许多例证，例如，释迦牟尼19岁创立佛教；李世民18岁起义，当了总司令，24岁当了皇帝，以此鼓励人们敢于做前人、洋人所没有做的事，敢于做马克思所没有做的事。解放思想这个口号本身是对的。一项伟大的事业往往需要解放思想作它的先导。记得周扬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的一篇文章里说过，我国现代史上出现过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这三次思想解放对于推动历史前进都起过伟大的作用。但是，1958年的“思想解放”却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是为“大跃进”服务的，是为“左”的指导思想服务的。那时只反右不反“左”，往往是哪个表现最“左”，哪个就是思想最解放。于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出来了，报刊上也大批“条件论”。根据“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要求，有人写文章说：“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当然，马克思不是不可以超过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态度和方法去推进超过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事业。象“大跃进”那样，违反客观规律，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怎么能够超过马克思呢！还应该说到，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正值党内滋长着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倾向。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

就说过：“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最无知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2页）1958年4月在汉口会议上又说，不要迷信科学家，对他们的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大家可能记得，“大跃进”年代拍的一些影片，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的形象往往是作为右倾保守主义者出现的。实际上，破除迷信变成了破除科学。

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思想解放，同实事求是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五十年代后期推行的思想解放却不是这样的，它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前面说过，这是反右派斗争中提出的理论。当时党内很多人认为这是列宁主义的发展。（这也说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实际上，它改变和违反了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则。成都会议说，我国还存在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插红旗、拔白旗”的口号，并指责不同意高指标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戴上“白旗”的帽子等于戴上“右派”的帽子。反右派斗争中兴起的“四大”又被用来推动“大跃进”。“四大”形似民主，实际上压制了民主。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阶级斗争为纲”，不仅使党的工作重点长期未能真正地转到经济建设上，而且，这种人为的斗争破坏了安定团结，打击了人的积极性。

第四，在计划工作中强调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

从1956年底的八届二中全会起，直到南宁会议，毛泽东同志多次说到，“不平衡是普遍规律”，“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并要求把这种一般规律运用于国民经济计

划。“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但是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不加分析地运用这个规律，则是不正确的。这是为“大跃进”服务的论点。它为任意加快速度，提高生产指标，不按计划办事提供了依据。1958年第12期《红旗》杂志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说：“人民群众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原理，来突破计划、超过指标、打破比例、打破平衡的。对于这样的革命行动，我们为什么要表示惊慌而不表示欢迎呢？”当时有些部门或地方的领导干部也写文章或发表讲话说，为了高速度，可以不管平衡，不管计划。

任意打破平衡、突破计划的思想在“大跃进”运动中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它的后果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 第五，“正确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应当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从此，八大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论断就完全搞乱了。个人崇拜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根本不应当把这个概念列入正确原则的范畴。提倡个人崇拜助长了个人专断，损害了民主集中制。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就不会有“大跃进”的失误。

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党的指导思想自发动“大跃进”以来长期坚持“左”倾错误，同党的组织路线遭受破坏有直接的关系。

以上思想和理论观点，都为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从此，一套“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就在党内树立起来了，代替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左”的指导思想一经形成，“大跃进”运动就全面展开了。

## 2. “大跃进”运动

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主要内容就是生产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一句话，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超乎客观可能性的高速度。

“大跃进”要求的高速度不是一般的高速度，是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南宁会议通过了一个口号，叫做“苦战三年，全国基本改变面貌”。速度问题上的调子越来越高。1957年底，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提出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到了1958年5月，“气温”上升，八大二次会议内定7年超英，15年赶美。8月更“热”，北戴河会议说，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就可以超过英国，超过美国也不要15年，7年就够了。我们可以做个比较。1985年1月19日，胡耀邦同志接见中央党校学员时说，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我国要根本改变面貌。他是在解释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时提出这个口号的。南宁会议的口号要求20世纪50年代末就基本改变中国的面貌。现在中央领导人的口号是到21世纪中叶根本改变面貌。哪个口号更符合实际呢？事实已经证明，前一个口号是很不现实的。它之所以不现实，不仅在于时间，而且在于方法。仅仅依靠苦战是很难根本改变面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大跃进”的时候，常常不讲政策，例如，急于过渡引起的“共产风”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只要群众苦战，不注意改善群众的生活，也是不讲政策的表现。劳动者营养不够，得了浮肿病，怎能建设搞上去！“大跃进”也不重视科学，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置客观规律于不顾，这样的苦战只能是盲目的蛮干。



高速度表现为任意提高生产指标。当时实行“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让我们看看粮与钢的“大跃进”指标。

1958年北戴河会议估计农产品已经出现了“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速度。1957年的粮食只有3900亿斤，这次会议却要求1959年的粮食达到8000—10000亿斤。1958年底的八届六中全会又把1959年的粮食指标提高到10500亿斤。大家知道，25年后，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才达到8000亿斤。能够达到这个产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实行了体制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如果没有这一点，今天也难以达到这个产量。“大跃进”的时候，“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那样的指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为了实现高指标，有的地方提出一些违反自然规律的措施，例如密植和深翻，植株的密度达到了不透气的程度，土地要翻几尺深。但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59年的粮食只完成340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1960年又下降为2870亿斤，降到了1952年的水平。

由于不合实际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农业生产已经过关，因此，决定大办工业，大办钢铁。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北戴河会议后在有限的的时间里要完成翻番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对于这个震动中外的运动，当时党内外都有人提出过“得不偿失”的批评。但是提出批评的人在后来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批判和打击。究竟应当怎样看大炼钢铁运动？第一，大搞群众运动对不对？全国城乡9千万人上阵，不少机关停止工作炼钢铁。应该说，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大轰大嗡的方法搞生产，是不符合生产规律的。第二，关于一切部门都为钢铁让路。当时的